

状

元

殿

试

卷



中国

ZHONGGUO

DIANSHISHIJIAN

状元殿试卷

DAQUAN

大全

上卷

邓洪波 龚抗云

编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国

状元殿试卷

大全

邓洪波 龚抗云

编著

上卷

上海教育出版社

序

一

一百年前，中国废除科举制度，这是完全必要的，舍此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在以“批判旧世界”为主要任务的大革命时代，人们无暇顾及科举制度的方方面面，而主要揭露它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弊病，也是必要的，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

然而，在废除科举百年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小康社会的今天，如果仍然拘泥于百年前对科举的评价，则如同百年前固守科举陈规一样，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而未能与时俱进。

在废科举百年后，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正确评价科举。这不仅是为了历史，更是为了今天。

二

科举制度的内容极其丰富，我们应全面、历史地评价。

作为取仕制度，科举制是为封建君主政治制度服务的，今天我们当然不应仿效它。然而，在 1300 年前的隋朝，科举制却是对商周以来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封建宗法制度的伟大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非常先进的。

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考试方法，并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考试制度。科举制的核心是考试制度，就其自由报考的政策、考试管理规则、以考试成



绩为主择优录取的原则等，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足以与“四大发明”相媲美。

科举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是在明末特别是清以后，主要是考试内容的陈腐与考试形式的僵化。

科举史，特别是考试史，是一部极其丰富的教科书。在教育考试领域中，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科举时代几乎都遇到过，科举时代没有解决的一些主要问题，今天我们虽有进步，但也仍然没有很好解决，如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至于作为考试工作基本原则之一的考试内容与考试形式的关系、考试的科学性与考试的公平性的关系等问题，千年的科举史更是给我们提供了极有教育意义的经验。

千年科举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缺乏理论研究。有详尽的规则，却少见理论著作，许多重大问题，反复争论，却不得其解，明清两代更是死气沉沉，最终导致科举失败。18世纪，西方传教士却在腐朽没落的科举制度中发现了它“合理的内核”——考试方法，把它介绍到西方，发展成为文官考试制度；20世纪，又建立了考试的理论，如教育测量学、教育评价学。中国废科举后，又传进了西方的考试制度、方法、理论。一千多年，中国有科举制，却无科举学，这是科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科举学的研究，任重而道远，可喜的是它已经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我以为，科举学的研究，当前应注重基础，论断应有根据，根据应准确可靠。

评论科举是非最终要看它是否选拔了有用的人才；而科举选拔的人中首当其冲的是状元。人才是否有用，最终要看他是否有能力；而科举是否注重能力，首先要看试题、试卷。

1998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提出“中国状元殿试卷研究”，我认为很重要，后来成为教育部考试中心“九五”科研规划课题。历时八年，锲而不

舍，现在终以《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面世，我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祝贺：

《大全》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搜罗宏富，确乎“大全”。全书以历代科举考试的科次为序，收录 449 科殿试资料。其中题卷齐全及有卷无题者 233 科，有题无卷者 216 科，后有朝鲜李朝殿试卷、中国历代登科表、中国历代武举登科表等三个附录，计二千二百余页，二百余万字，可谓巨制宏编，是目前条件下能够最大程度做到的“大全”。

第二，搜寻用力，填补文献空白。研究科举史，最感资料缺乏的元代，邓洪波教授利用访学境外的机会，获得元刊孤本文献，将元代各科左、右榜状元殿试资料差不多收录齐全，填补了一大文献空白，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第三，用心考究，多有独到见解。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戌科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今藏青州博物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但邓洪波教授在整理研究中，发现其多处文理不畅，不能句读。这种从文本出发而又归于文本的精神，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独到见解十分可贵。

第四，认真严谨。由于种种原因，状元殿试卷有不同版本流传，对于这种情况，《大全》分别处理，歧异较少者，出校勘记标注，差异较大者则两卷并存，以供读者参考。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值得称许。

第五，图文并茂。《大全》收录状元图像、手迹、碑刻、印章、著作书影及状元第、状元牌坊等弥足珍贵的图片 400 余幅，插入相关部分，有利于读者对古代状元形成感性认识。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并期待《大全》的出版将推动科举史、考试学的研究走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杨学为

2005 年 8 月 16 日于北京



序

我认识邓洪波先生已经快二十年了。我们定交的缘起是书院的研究。1985年，我出版了《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对官学教育与科举作了初步的整理，接着就是要研究书院。我开始与岳麓书院联络，联络的人就是邓洪波先生。那时，他还很年轻，治学十分积极，而对书院历史的掌握也极为深刻。1987年，我终于第一次到了岳麓书院，到火车站去接我的人就是邓先生。我看到书院环境清幽，感动不已。这都是前辈杨慎初、陈谷嘉等人建设的结果。那时，书院一些新栽的树都还很小，大概才种了六、七年。我对这里的环境常怀感系，所以在1992年又来了一次。2003年，我第三次来岳麓，看到那些树都已经长大，和那些有数百年树龄的古木苍郁成拱，更觉得它是培育读书人种子的地方。这里的人文气息，和它千年教育的历史鼓舞着每一位关心学问的人做生命宇宙与人生的探索。

邓洪波就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写出他十数本有关书院的重要书籍。最近，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很高兴出版了他的《中国书院史》。这是一本有着800余页的大书，它的出版标示了他学术上的重要成就。在书院研究之外，更令我感到敬佩，而有点意外的就是，他对科举考试制度的兴趣和深入的知识。他在翻读影印本文渊阁的《四库全书》、搜寻研究材料之余，竟然能同时注意有关



历代状元的事迹，收集他们考试的卷子。1993年，他出版了《中国历代状元殿试卷》。就我所知，这是近一百年来第一次出版这一类的书。当我收到它时，有点意外。主要是因为我没想到他竟然会花工夫在这么一个题目上面。当然，中国的科举与教育是分不开的，而且书院又是中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如果研究书院的人不对科举有基本的认识和关心，那么他对书院教育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心得。

我不免想：这样的书有什么用处。老实说，在明清时代，各种各样的范文是对准备考试的学生有帮助的，名家所选批的范文常常流传很广，影响不只是考生而已，事实上还左右一代的文风和思潮。但是在今天，这样的“大全”已经不可能产生相同的作用。尤有进者，状元卷很少有流传后代的著名作品，比诸唐代的《文选》或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那么状元卷的文字绝对不能相比。就是著名的王维，他虽然是开元九年辛酉科状元，但是我读了他的卷子，同意这篇文章绝对不是他最好的著作。

然而，这一本大全却有它重要的历史研究意义。这就是它们相当完整地把中国历代状元对经典解释、国家事务、甚至于自然知识的看法呈现给我们。从这些考试卷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治学风尚、出题官员对经典或实务的见解。我们也可以看到考生们的想法。我曾经将《宋会要》所收录的殿试试题略作分析，颇觉得它们相当忠实地反映了宋朝皇帝对当时政府所遇到的问题的关心。状元卷的内容因此带有重要的时代讯息。历史时代不同，社会的关心自然不同，考试的题目也跟着不同，而考生的答案也就不同。这本大全就因此有它在历史研究上的重大意义。

最近学者研究中国的“考试文化”，注意到许多过去我们比较不重视的课题，其中之一就是尝试从考题和答案来分析当代的文风及思潮。这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北宋时，欧阳修主持考试，专以古文录取考生，引起风潮。欧阳修是古文及史学巨擘，影响所及，文风丕变。这则故事后代传为佳话，当然

是因为欧阳修名气很大的缘故。但是历代文风和思潮的转移并不一定都这么突然，要了解历史的改变，那就得仔细分析这些流传下来的试题和答案。

中国是一个重视任用贤才的文明社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乃是世界上第一个挑战世袭制度，主张政府应该任用贤才的国家。换句话说，中国人从一早就拥抱任用才能体制（meritocracy）的理想，所以外国学者都艳称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官僚体制（bureaucracy）的国家。今天，在中国文化所影响的地区，包括朝鲜、日本，乃至越南，各地仍然受考试制度的影响。在这些地方，社会还是非常尊崇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大学考试的“状元”更往往享受一种莫名奇妙的崇拜。这样的“封建遗毒”不期然地产生了对“状元”或只会读书的人的过分期待，这是不健全的现象。事实上，我在我的《中国传统教育史》（*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A History*）一书中，认为传统中国的考试制度往往造成所谓的“权威人格”，对知识的权威缺乏客观批判、论辩的能力。社会不可以太过期待只能考试的人。只是由于在传统中国，状元的地位和待遇都特别隆盛，还演化成许多戏曲、传说，以至过分地夸张读书本身的重要性。

我于1964年参加“联考”，有幸也考了个状元，进入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习。但是多年以后，我已经淡忘这件事了。因此当我于1993年收到邓先生的《中国历代状元殿试卷》时，完全没想到它和我自己的经历有什么关系，心中想到的只是如何可以用这样的材料来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科举史，阐明历代的文风和思潮。2000年，邓教授应我邀请，到纽约研究一年，从我的朋友处听到我是当年的所谓状元，大为兴奋，大概是以为可以用我来卖书吧！于是这就开始了我这个状元的“第二生涯”。事实上，学生们要考试成绩好，固然必须有一定的、正常人的优秀品质。但是要考第一，这完全是运气。

虽然历代状元享受优渥的待遇，但是查考他们的生平，很快会发现他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表现辉煌。传统中国的考生只知道勤练八股、背诵部分的儒家



经典及其注释，而思想及论旨又往往陈陈相因，这种人社会经验和应付社会事务的能力一定无法太纯熟。在现代多元的社会，学业上的状元更只是种种状元里的一种，如果他们能继续在学术上发展，那么或许会有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们应该更谨记“行行出状元”的说法：我们应该在读这本《大全》时，切记多元的现代社会应该鼓励每一个它的年轻成员去努力追求他们各自的爱好，成为他们各自所擅长领域的状元。

《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充分反映了著者们的研究水平和作业的细心态度。这样一本书对研究中国教育史和科举史的学者们用途非常的大，这是不用我在这里吹嘘的。作为一个研究传统中国教育史的学者，我在这里用期盼和兴奋的心情来欢迎它的出版。

李弘祺

国立台湾大学讲座教授及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研究院博导及城市学院历史系教授

2005年8月13日

序

状元作为“人中之龙”和“一科之长”，是科举阶梯中的顶级科名，向来是科举人物的代表，在科举时代具有无尚的荣耀，为人们津津乐道。状元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在传统戏剧中，状元更是科举制度的象征，民间不少人便将科举直接理解为“考状元”。

“禹门三汲浪，平地一声雷。”这是古时候经常用来形容进士尤其是状元及第后命运骤然改变的一联诗句。作为科举时代的最高科名，状元及第具有崇高的荣誉，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宋太平兴国三年状元胡旦在及第之前曾说：“应举不作状元，仕宦不作宰相，乃虚生也。”（《澠水燕谈录》卷4《才识》）宋代状元登第仪式风光无比，甚至有领兵数十万收复幽州蓟州、班师凯旋都不可与状元相比的说法。明清两代的“状元”一词成为固定科名，全国每三年才产生一名状元，其难度和荣誉大到人们往往要将其神化的程度。

历代都有一些关于状元的奇闻逸事，还有许多类似神话的状元故事，其中有一些具有科名前定的迷信成分，有一些传说则不符合历史事实。例如，关于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榜进士名次的确定，有一种流传很广的错误说法。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殿试之后，读卷大臣评阅完毕定好初步名次，依例前十名试卷进呈，由皇帝最后钦定名次。各科殿试进呈试卷，有依原先次序发下者，



也有移动次序而发下者。甲辰科主考官最初进呈的名次是朱汝珍第一、刘春霖第二、张启后第三、商衍鎤第四，光绪皇帝看了进呈殿试卷，认为第二卷比第一卷更好，第四卷比第三卷更好，于是将一、二卷名次对调，三、四卷对调，结果钦定名次变为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鎤、张启后。但流行的传说是慈禧太后当时对广东人恨之入骨（因为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是广东人），加上她害死珍妃，心中有鬼，一见广东人朱汝珍的名字就厌恶，而当时正要为她做七十大寿，天又大旱，而刘春霖不仅名字具有吉祥意味，而且籍贯是直隶肃宁，渴望“肃靖安宁”是饱尝八国联军之苦后的慈禧的心愿，因此将刘春霖点为状元，将朱汝珍贬为第二。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传言，因为确定前十本殿试卷名次的是光绪而非慈禧，加上按清朝科举定制，进呈的试卷仍然是密封的，光绪皇帝也无法看到试卷作者的籍贯和姓名，要等到最后确定名次后才拆封。而且，若慈禧看得到殿试卷姓名且那么讨厌朱汝珍的话，完全可能将其置于第十名而不会让其得个榜眼。因此所谓慈禧太后将状元刘春霖与榜眼朱汝珍名次对调的流行说法是以讹传讹。其他还有一些关于状元是碰运气或靠相貌而侥幸大魁天下的说法，多数也有戏说的成分。

传统社会有“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马如飞”的诗句。所谓“十里”，并不是一个确数，只是形容一大片杏花的广大，但这句古诗足以让现代人想象出过去杏花连绵数里、一望无际的壮美景色，也生动地描绘出状元及第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轻快喜悦的心情。但是，要达到中状元的境界，一定要经过寒窗苦读，具有深厚的学养和功底，具备相当的文章才华和经史造诣。历代状元中出了许多名人或重量级人才，便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素养好、事业起点高，再加上自身的努力，因而成就了一番伟业。科举时代流行着“科名以人重，人亦以科名重”的格言，这是在科举选拔了大量人才所以显得重要，人们因而高度敬重科举，科名与人两者之间长期良性互动之后形成的说法。

当然，状元人物也不见得个个都成大器。大凡有成就的人多为素质较高的

人才，而高素质的人不一定就必然会有成就者。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推孟（Terman）和他的助手们，曾对一千多名智商很高的天才学生进行长达半个世纪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成功的人物绝大多数智商都很高，但达到一定的智商高度之后，成功与否就主要取决于非智力因素了。科举及第仅仅提供了一个入仕施展抱负的机会，至于后来在政界或学术上取得多大的成就，往往要看其强烈的事业心和坚强的意志，包括性格、气质、阅历、时代、环境和机遇等都会对一个人成就的大小产生作用和影响。就像我们不能说现代高考状元中有些人日后默默无闻，就指责高考只会选拔高分低能者一样，科举入仕者中有些人无大作为是不足为奇的正常现象。宋太宗曾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宋史·选举志》）宋太宗很明白科举所取之士不可能个个都成大器，只要有百分之一二十的人能成大才便算成功。

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状元们通过这些殿试卷，登上了科举金字塔的顶峰。而这些殿试对策文往往字斟句酌，四平八稳，有的人便认为根本没有多少学术价值或文学价值。然而，我们应该明白，命题作文与平日的文学创作有所不同，考场中所写之文应有一定的规范性，这是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维持可比性和客观评卷的公正性的必然要求。在考场上限定时间内作文，一般不能任意发挥“白发三千丈”的奇思异想，而应根据命题来铺叙。虽然状元殿试卷是考场上临时草就的命题作文，不比平时有感而发认真推敲的文章那么言之有物，那么精细，但这些殿试对策也反映出作者临场能发挥出高超的文字水平，或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或对经史典籍有精深的理解，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到某些启发。

状元研究是“科举学”的热点之一，它从一个侧面展现出科举学丰富多彩的内容。在中国大陆1980~2003年出版的一百七十一本各种科举专书中，状元研究的专书相当多，达五十二本，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又有多本是状



元卷的汇编，应该说既有的成果已相当丰富了。邓洪波教授等编纂的《中国历代状元殿试卷》，是最早的一本状元卷，1993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但邓洪波教授仍不满足，为再行编出这本收罗最全、考证精详的《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十几年来孜孜矻矻，神州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东瀛日本，上穷碧落下黄泉，升天入地求之遍。其资料收集之广泛程度，可谓空前；其求索精神之执着程度，令人感佩。以往邓教授已编纂过《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国书院学规》、《中国书院章程》，并发表过《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国书院史》等一系列的书院研究论著，整理学术巨著《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绩斐然，在收集资料、编注古籍方面已经有很好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编纂这本《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自然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

科举与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独特的两个方面，也是教育史上具有密切互动关系的两条主线。我自己是治“科举学”为主，旁涉“书院学”；邓洪波教授则是以“书院学”为主业，兼治“科举学”。由于为邓洪波教授引荐与教育部考试中心参与中国考试史研究，进而生发出编纂本书的任务，因而我与这本厚重的《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也有间接的关系。承洪波兄抬爱，嘱我介绍一二，故恭敬从命，草此短引，以表祝贺之情。

刘海峰

2005年2月5日于厦门大学

前 言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中国科举时代读书人尊奉的信条，而大魁天下，高中状元，更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目标，正所谓“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千余年来，无数莘莘学子，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奋志芸窗，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特有的状元效应。

“状元”是对科举考试中最高一级考试——唐至五代为省试，宋元明清为殿试——所录取的第一名进士的通称，其名始于唐代。当时，门下用奏状报其等第名次，因状元位居状首，故又称“状头”；而张榜公布时，状元照例名列榜首，又有“榜首”之称。唐代进士不分甲，原则上每年考取一次，直至五代都是这样。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始分殿试合格者为五甲，一甲第一名称状元，也有称第二、第三名为状元者。元顺帝时，改五甲为三甲，一甲限取三人，状元专指一甲第一名，此后成为定制。明清时，殿试分三甲发榜，分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一甲三名，依次称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以状元居鼎甲之首，又称为“鼎元”。

状元成为科举考试的最高荣誉和士人在科场中的最高追求目标，有一个历史过程。一般认为，隋炀帝大业二年（606）设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此为科



举之始，但那时还没有状元之称。唐代科目甚多，据统计有百余种，其中常设科目就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等，以明经、进士两科最盛，虽然进士科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以致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但进士第一名往往与其他科目的第一名并列，状元还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宋代科目比唐代减少，仍有进士、九经、五经、学究、开元礼、三史、三礼、明经、明法诸科，并设武举，但皇帝举行殿试并成为定例的只有进士一科，状元至尊至贵的地位开始确立。辽、金曾以词赋、律令取士，元也设有经义科。只有到了明清时期，除临时性的制科外，进士科成为科举中唯一的科目，状元至高无上的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需要指出的是，宋代开始文武并举，状元有文武之别，只是武状元的声誉远逊于文状元，不太为人所知而已。

状元的产生不容易，读书人在唐代要通过州县试、省试两关，宋代要通过解试、省试、殿试三关，明清时则要通过郡试、乡试、会试、殿试四关，参加大小十几场甚至几十场考试，历经数年、十数年，甚至数十年，战胜成百上千的对手，才能成为状元。试以科举制度已臻成熟的明清时期为例，来推演状元产生的程序。

郡试，又叫童试，大体相当唐宋时的州县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的考试。县试由知县主持，凡本县同考童生五人互结，并请县廩生作保者，始得参加考试，试期多在二月，考四至五场，内容为八股文、诗赋、策论等。考试合格者才能应府试。府试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试期多在四月，考试内容及场次与县学相同。府试合格者方可参加院试。院试又叫道试，由主管一省教育的学道（后改称学政）主持，各府童生三年参加一次，试期不定，轮环进行，考八股文与试帖诗，分正试、复试两场，合格者始由童生改称生员，即秀才。读书人通过童试获取秀才身份后，才有资格进入地方或中央的官学学习，称为“入泮”。在学秀才通过岁考和科考，按文章优劣分附生、

增生、廩生、监生（太学生），成绩特优者还可通过拔贡考试成为贡生并进入仕途。

乡试是在各省省会和京城顺天府举行的考试，这是唐宋时所没有的。照例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喜庆之典加科为恩科，由皇帝钦命正副主考官主持，凡获秀才身份的州、县、府学生员、监生、贡生等均可参加。考试安排在秋季八月举行，故又称秋试，分三场，每场三天，考四书五经文、策问、诗等内容。乡试合格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只有举人才有资格进入会试。

会试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与宋代的省试属同一级别，每三年举行一次，安排在乡试次年的春季二月或三月进行，故又称春试。逢辰、戌、丑、未年为正科，也有恩科。考试时间、场数、内容与乡试基本相同，但程度更难。会试合格者叫贡士（习惯上仍称作举人），第一名称会元。只有获得贡士资格者，才可能进入最后一轮的殿试。

殿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考状元”，明清时在会试发榜后择日举行。从理论上讲，殿试是由皇帝亲自在宫廷殿堂上主持进行，所以又称“廷试”、“御试”。参加殿试的贡士虽然原则上不再淘汰，但竞争状元和鼎甲人选，确定新科进士的先后名次，区分三甲，是科举“全程赛跑”的最后冲刺，更为士林瞩目。

需要指出的是，殿试制度的确立有一个过程。殿试之名始于唐代。据杜佑《通典》卷十五记载，“武太后载初元年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唐会要》卷七十六、《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九都有类似的记录。于是，不少人就将武则天的“殿前试人”等同于宋代的殿试了，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四就称，“二月辛酉，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资治通鉴》影响巨大，后世学者多因袭此说，认为殿试制度始于武后。其实不然。武后的“殿前试人”，实际上是唐代的省试，并非宋代科举考试中的殿试，而且，终唐之世，仅此一次，实属偶一为之，并未形成制度。



据记载，永昌元年（689）十一月，武后改年号为载初元年，而且变更历法，改寅正为子正，以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查永昌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为公元689年12月31日，故载初元年二月，则为公元890年了，此即始有殿试之名的确切年代。在唐代，没有制度意义上的殿试，状元为省试的第一名，由主持进士科考试的知贡举录取。

殿试制度的确立，是宋初才有的事情。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三、十四及《宋史·选举志》等记载，太祖开宝五年（972），“上召对讲武殿，始下诏放榜”，此为殿试的前奏。六年三月，知贡举李昉主持省试，但“取舍非当”，录取“材质最陋”的同乡武济川等人，引起不满。宋太祖下令复试新科进士，并在讲武殿亲阅试卷，录取进士二十六人。是省试之外，始有殿试，且“自兹殿试遂为常式”。八年，“御试与省试名次，始有升降之别”，殿试与省试完全分开。皇帝主持殿试，重新确定进士名次，将取士之权从知贡举手上夺回，实为殿试制度确立的标志。

宋代殿试制度包括施行弥封、誊录，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等级，分进士为五甲但不黜落，唱名赐第等内容。殿试制度的实施，改变了唐至五代以省试为贡举最高一级考试的现实。从此，殿试高居省试之上，权柄操于皇帝手中，既可以防止知贡举把持科举，结党营私，以利广收人才，又变“恩归有司”为“恩由主上”，进士皆为“天子门生”，有利于集权统治的加强。因此，元明清三代皆沿用殿试制度。

殿试的前一天，由鸿胪寺官员负责设置御座、黄案，由光禄寺官员安放试桌，排定位次。第二天黎明时分，参加殿试的贡士都到殿前的丹陛上排列好，每人赐宫饼一包，王公百官分立两旁。随后，皇帝在声乐声中升殿。大学士从殿内黄案上捧出试题，授给礼部官员放到殿外的黄案上。众官员及考生赞拜行礼后，礼部官员散发题纸，考生须下跪接受，并归到自己座位上开始答题。按规定凌晨入场，日落交卷。在这段时间内要完成策问文章，还要书写工整。